

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

——上海市的经验研究

徐安琪 刘汶蓉

【摘要】 文章利用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 1 921 个已婚男女样本资料,将个人的绝对和相对资源、生活经历、夫妻互动、性别文化规范和工作时间限制作为初始变量,将男女各自认同的自己承担家务的相对量作为中间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发现,家务分担的相对量与妻子的公平感认同呈最大负相关,并成为其他因素影响其公平感的中介,但与丈夫的公平感无显著相关。

【关键词】 家务分配 性别差异 公平性

【作者】 徐安琪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一、研究回顾

男女两性家务劳动分担不均一直是家庭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西方对家务劳动及其性别分工不均与经济、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早,并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影响家务分配的因素尤其是对家务分配不均原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时间限制变量。丈夫或妻子的工作时间越长或工作越缺乏弹性,做家务的时间就愈少,市场价值较高的一方可能在市场工作上投入的时间较多,因此家务劳动的时间较少(Coverman, 1985; Spitze, 1988)。

其二,资源交换假说。该理论假设,丈夫和妻子的公平感来自对双方给婚姻带来资源的比较。一些研究以夫妻的教育程度、收入及职业声望的相对资源为指标,得出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声望相对较高的一方,担负的家务责任较少的结论(Maret 等, 1984; Erickols 等, 1979)。受过良好教育、职业声望和收入较高的女性会更多地购买家庭服务(Cohen, 1998; Oropesa, 1993)。也有学者沿用交换理论,但与一般经济交换理论单纯地视可交换资源为经济支持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婚姻资源更重要的是丈夫和妻子在扮演社会赋予男女角色(男人养家、女人理家)的成功与否。所以丈夫在外挣钱多、承担家务少被社会所认可,而妻子即使挣钱多但家务做得少也不被社会认可。这样就解释了为何挣钱多的女性也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弥补了“经济交换理论”的缺陷(Zuo 等, 2001)。

其三,社会性别视角。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性别作为新的预测指标日渐被纳入家务劳动分工研究并成为流行理论,大量学者借用社会性别建构主义理论来解释家务分工的原因(Greenstein, 1996; Thompson, 1991; Zvonkovic 等, 1996)。该理论借用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民俗现象学和女权主义对日常生活的解释,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受社会结构和隐性的不平等权力的影响。

其四,制度建构和社会化解释。男女在婚姻中性别角色的分化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婚姻制度强化了所谓天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其他社会制度维持了男性的家庭供给者地位和女性的依附地位。随着女性对家庭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大,男性对家务的贡献也越多,但男性完全不工作的家庭情

况则成不对称关系。有研究认为,比妻子挣钱少的丈夫不做家务,是夸大“男性气质”的结果(Hochschild等,1989; Brines, 1994)。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性别角色态度是决定家事分工的主要预测变量,夫妻性别角色态度越传统,丈夫的家务参与越低,而丈夫的性别角色态度越呈现非传统倾向,其家务的参与也越高(Hiller, 1984; Brody等, 1985; Rexroat等, 1987)。正因为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根植于文化传统,男性特权被社会结构固定下来,使不平等的观念公正化(Thompson, 1991; Wilkie等, 1998)。

其五,生活经历分析。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层理论的一个分支,它关注的是年龄、工作经历、家庭结构、生命周期、婚姻状况、子女和其他生命历程对家务劳动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推迟婚姻和亲职会使丈夫和妻子更平等地承担家务,因为人们等待结婚和有孩子的时间长一些的话,更易接受独立和多元的角色认同(Coltrane, 1990; Pittman等, 1996)。无子女夫妻和单身、离婚或寡妇(鳏夫)由于家务量的减少,被认为更少做家务,而退休人员的情况更为混合和复杂(South等, 1994; Szinovacz, 1992; Szinovacz等, 1994);有更多和更小的孩子会增加对家务劳动的需求,孩子越少、子女的年龄越大尤其是女孩越有可能帮助做家务(Waite等, 1992)。

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定量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男女家务分配及其变迁的简单描述或分析阶段,其中几项大型调查研究都显示出相近的结果,从性别差异看,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多于男性;从城乡差别看,农村丈夫的家务参与率明显低于城镇;从分工看,日常性家务以妻子为主,非日常性的重体力活以丈夫为主,子女教育由夫妻共同承担的更多一些(王亚林, 1993; 沙吉才, 1995; 沈崇麟等, 1995; 陶春芳等, 1995; 徐安琪, 2000)。2000年男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2.7小时(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2001)。

二、研究设计

由于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家务分工的简单描述,缺乏精细的定量分析和对家务分工公平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结构关系的深层次探讨,因此,本研究在以性别视角考察家务分工的同时,更关注当事人对家务分工的公平性感受,以及影响两性家务分工满意度的不同机制、因素和程度。我们同时还认为,夫妻双方的年龄差、个人健康状况及其家庭责任心等夫妻互动适应变量,也可能对家务分配及其满意度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将增加相关指标作预测。我们先用回归分析方法,在排除其他因素的相关作用后,估计性别对家务贡献和分工满意度的净影响;然后将男女各自认同的自己承担家务的相对量作为中间变量,借助于路径分析的方法,预测对家务分工公平性起作用的影响机制及其多元因素。其基本框架见图1。

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来自2000年12月进行的“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中1921名已婚男女样本的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从全市18个区(县)97个街道(乡镇)196个居(村)委会的2352个样本户中,各抽取一年龄在18~64岁的男女为被访对象。1921名已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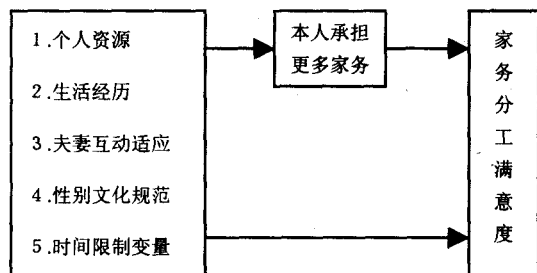


图1 家务分工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框架

者中,男性占55.8%,市区被访者为63.8%;丈夫的平均年龄为44.6岁、妻子为44.2岁;夫妻平均婚龄18.2年,平均生育子女1.23个;被访男性平均受教育9.9年,女性为9.22年;丈夫的年平均收入为13556元,妻子为9138元。为了提高调查数据的代表性,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上海城乡、性别比以及本调查的户内人口数等相关资料,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家务分配及其满意度的描述性分析

1. 个人家务时间和双方相对贡献

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已婚女性每天在家务劳动上所花的平均时间是丈夫的 2.12 倍(见表 1),城市 60%家庭的家务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为主的仅占 13%;农村家务活由女性揽下的更高达 68%,只有 10%的家庭以男性为主。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已婚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 4.36 小时,男性为 1.54 小时,因此,与全国相比,上海市已婚女性的家务投入时间明显较少,而男性的家务参与时间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家务劳动的具体分工

从分项家务看,最费时、重复的做饭、饭后洗刷、洗衣服、清扫整理、孩子照料等琐碎家务大多由女性承担,仅非日常性的重活主要由男性包揽,在辅导子女功课方面,两性的负责率较接近(见表 2)。

表 1 城乡夫妻对谁承担更多家务的认同 %

	男自述			女自述		
	郊县	市区	小计	郊县	市区	小计
配偶承担更多	65	60	61	9	12	11
差不多	24	25	25	21	29	27
本人承担更多	12	15	14	70	59	62
本人家务总时间(小时)	1.78	1.71	1.73	3.46	3.73	3.67
N(人)	300	550	850	396	675	1071

表 2 城乡已婚者自述的以女性为主承担各项家务的比重 %

	做饭	洗碗	洗衣服	打扫卫生	日常购物	照料孩子	辅导子女功课	重活
合计	81	76	90	85	53	87	52	5
郊县	87	88	96	86	41	89	50	5
市区	77	67	85	84	63	86	54	6
χ^2 检验	61.99***	262.39***	140.70***	6.15*	206.76***	6.31*	3.53	1.49
N(人)	1884	1884	1868	1879	1897	1674	1427	1677
缺省值(人)	37	37	53	42	24	247	494	244

注:由母亲、婆婆、岳母、女儿、媳妇、家里其他女性为主承担的都计入女性,由父亲、公公、岳父、儿子、女婿、家里其他男性为主承担的都计入男性。缺省值中包括无此项家务或承担家务者性别不明。*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下同。

从城乡差异看,市区女性承担家务相对较多,主要体现在洗碗、洗衣服和做饭上;在辅导子女功课和重活上无显著差异;而郊县男性购物的比重高于女性,可能与家庭经营所需的生产资料往往体积、价值较大或需男子拿主意有关。

3. 家务分工满意度

由于大多数女性既要外出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她们首肯家务分配不公平的比重明显较高,对家务分工满意度的平均打分为 3.20 分,低于男性的 3.34 分(显著性检验 $p < 0.001$,见表 3)。郊县男性对家务分工的满意度低于市区男性($F = 8.32, P < 0.004$),这或许与他们更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有关。

(二)家务劳动时间和分工满意度的实际性别影响

由于描述性的简单分析结果往往与隐藏着某些虚假相关,难以准确地揭示实际存在的性别及城乡差异。为了探究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和相对贡献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将在排除其他

表 3 城乡男女家务分工满意度的方差分析 分

	市区	郊县	全市
男	3.35	3.28	3.34
女	3.20	3.19	3.20
合计	3.28	3.23	3.27
F 检验	36.80***	12.75***	50.37***

表 4 影响个人家务时间和双方相对贡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本人家务劳动时间		家务分工满意度	
	Beta	Sig.	Beta	Sig.
性别	0.284	0.000	-0.068	0.005
年收入	-0.083	0.000	0.006	0.743
教育程度差(夫-妻)	-0.007	0.553	-0.020	0.212
本人收入占夫妻收入的比重	-0.063	0.000	-0.041	0.031
地区(1 为城市)	-0.005	0.678	0.030	0.090
结婚年数(以 0~2 年为参照)				
3~7 年	-0.018	0.349	0.174	0.000
8~13 年	0.077	0.002	0.167	0.000
14~19 年	0.107	0.000	0.175	0.000
20~30 年	0.122	0.000	0.213	0.000
31 年以上	0.143	0.000	0.295	0.000
子女数	-0.011	0.503	-0.084	0.000
本人年龄大得多	0.018	0.216	-0.061	0.001
配偶家庭责任心较差	0.055	0.000	-0.092	0.000
本人健康状况较差	-0.016	0.205	-0.040	0.017
受教育年数	0.014	0.308	0.015	0.430
认同“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	-0.049	0.000	-0.029	0.075
本人工作(包括路途)时间	-0.480	0.000	0.016	0.404
本人承担更多家务			-0.135	0.000
F	221.28***		14.05***	
R ²	0.492		0.062	

变量的影响后,更客观、准确地评估两性家务劳动绝对和相对的贡献。表 4 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即使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后,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仍比丈夫多约三成;(2)影响两性家务贡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户外工作时间;(3)经济收入与家务分担呈负相关。由于下述两回归模型的 R² 分别为 49% 和 38%,拟合度良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往用单变量统计分析方法所描述的女性家务劳动量高于男性 2~3 倍的结果,往往忽视了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忽视了男性在家务之外的社会角色和对家庭经济的贡献。

表 4 同时还表明,已婚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满意度低于男性,但差异性并不很大,而夫妻家务分担的相对工作量是影响家务分配公平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三) 家务分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考虑到夫妻家务分工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我们将对男女分别建立路径分析模型来进行估计。路径分析结果显示:(1)过重的家务对当事人家务分工满意度的重要影响,仅在妻子模型得到验证,而男性对家务公平性的认同与其所承担的家务量无显著相关,故以相对的家务贡献为中介变量的通径机制无效。(2)从个人资源看,收入的绝对资源优势与家务分担和公平性认同均无显著相关,但教育和收入的相对资源有优势者则有更大的概率较少做家务。(3)从生活经历看,居住地对男女家务分工满意度都无显著相关,仅对双方的家务贡献有微弱影响;夫妻在新婚期对家务分工最不满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意度上升;子女数对家务分配格局无影响,但子女越多,妻子越认同家务分工不公平。(4)从夫妻互动看,身体较好、家庭责任心较强者优先更主动地承担较多家务,但他们对家庭劳务分配不满意的概率也相对较大。(5)从性别文化规范看,受教育越少、性别角色意识较传统的男性更少承担家务,而受教育年数对女性家务分工满意度呈正相关。(6)工作时间变量对丈夫不起作用,即有薪工作时间少的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而男性即使户外工作时间短也依然较少承担家务。

四、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上海市已婚男女的家务劳动总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与上海家庭经济收入较高,家庭劳动电器化和社会化程度较高有关。此外,上海市已婚男子家务劳动的参与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女性投入家务的时间仍是男性的两倍多。

表5 家务分工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自 变 量	丈 夫 模 型				妻 子 模 型			
	家务 劳动	家务分工满意度			家务 劳动	家务分工满意度		
		直接 影响	间接 影响	总影响		直接 影响	间接 影响	总影响
个人的绝对和相对资源								
年收入	-0.027	0.003	—	—	0.034	0.026	—	—
教育程度差(夫—妻)	-0.109***	-0.122***	—	-0.122	0.026	0.069**	—	0.069
本人收入占夫妻收入的比重	-0.193***	0.015	—	—	-0.133***	-0.044	0.026	0.026
生活经历								
居住地(1为城市)	-0.042	0.045	—	—	-0.063*	-0.015	0.012	0.012
结婚年数(以0~2年为参照)								
3~7年	-0.140***	0.108**	—	0.108	0.174***	0.267***	-0.034	0.233
8~13年	-0.176***	0.159**	—	0.159	0.303***	0.258***	-0.060	0.198
14~19年	-0.186***	0.179***	—	0.179	0.356***	0.286***	-0.070	0.216
20~30年	-0.201***	0.235***	—	0.235	0.269***	0.288***	-0.053	0.235
31年以上	-0.134**	0.238***	—	0.238	0.242***	0.415***	-0.048	0.367
子女数	0.007	-0.020	—	—	0.032	-0.092**	—	-0.092
夫妻互动适应								
本人年龄大得多	0.047*	0.010	—	—	-0.041	-0.108***	—	-0.108
配偶家庭责任心较差	0.145***	-0.037	—	—	0.227***	-0.114***	-0.045	-0.159
本人健康状况较差	0.083***	-0.047*	—	-0.047	-0.102**	-0.063**	0.020	-0.043
性别文化规范								
受教育年数	0.120***	0.016	—	—	-0.016	0.075**	—	0.075
认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0.068**	-0.081***	—	-0.081	0.038	0.032	—	—
时间限制变量								
本人工作(包括路途)时间长	0.015	0.008	—	—	-0.146***	0.014	0.029	0.029
相对家务贡献								
本人承担较多家务	—	-0.040	—	—	—	-0.197***	—	-0.197
F	16.76***	5.45***	—	—	18.11***	14.72***	—	—
R ²	0.124	0.047	—	—	0.129	0.115	—	—

注:表中数据第一和第五列分别是夫妻模型中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家务劳动的相对贡献”(即“本人承担更多家务”)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第三和第七列为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家务满意度的间接影响系数,第二和第六列为自变量对家务分工满意度的直接影响系数,第四和第八列为各自变量对家务分工满意度的总影响即直接影响系数和间接影响系数之和(只对具有统计意义的通径系数加以估计)。

然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后的分析结果显示,已婚女性实际承担的家务量并非如描述性分析结果那么沉重,妻子在家务上所花费的时间仅比丈夫多约三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往用简单分析方法所获得的女性家务贡献高于男子2~3倍结论的偏颇性;同时,尽管已婚女性更多地对家务分工不满意,但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后,她们的不公平感相对减弱(Beta值为-0.068)。因此,我们不能把女性承担较多家务简单地归结为男性社会权力结构运作的结果,是女性家庭地位卑下的反映,也就是说,仅用社会性别理论解释家务公平性尚不充分。

路径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资源交换假说、生活经历分析、性别文化建构和夫妻互动适应理论都对家务分配公平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我们尤其注意到夫妻模型所报告的不同解释机制,其最大的差异在于,家务分担的相对量与妻子的公平感认同呈最大负相关,并成为其他因素影响其公平感的

中介,却与丈夫的公平感无显著相关。这无疑与两性为社会所期待和实际肩负的家务压力不同有关,而且,模型所报告的其他研究结果,如受教育越多、传统性别意识越淡薄的男性有更大的概率多做家务,即使工作时间较短的男性依然不多做家务,以及子女数仅对女性的家务分配公平性有负面影响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社会文化规范对性别分工的潜在影响。

其次,家庭责任心较强、健康状况较好的或年龄相对较大者,往往更主动地承担较多家务,他们(主要是其中的女性)抱怨家务分配不公平的概率相对较大也情有可原。我们引入相关的夫妻互动适应变量,是考虑到大多数夫妇的相互关系良好,因此,家务分配往往也交融着感情因素和相互的协调适应,其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也有不少则出于体谅、取悦或爱心,但丈夫缺乏家庭责任心会增加妻子不公平感的概率也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所证实。

再次,具有相对资源优势、在工作上投入较多时间的一方往往较少承担家务,尽管这是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即市场价值较高一方以社会角色为主,另一方则更多地“主内”,但市场经济本能地排斥劳动力成本较高(生儿育女、家务负担重等)的女性(主要是中老年女性),以致她们只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务也是客观事实。

最后,随着结婚年数的递增、有薪工作时间的减少,两性的家务时间有所递增(见表4),但就其相对的工作量而言,女性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务贡献都大于男性,尤其在孩子青春期阶段更为辛劳(见表5)。但无论是丈夫或妻子模型,都显示随着婚姻的延续,他们对家务分工的满意度日渐递增,这一方面表明,新婚期的夫妻互动往往处于“磨合”阶段,尤其是子女的诞生和琐碎家务的日增,使他们难以协调适应,加上年少气盛,往往缺乏包容退让的耐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性角色的不断整合,他们逐渐适应并减少了对家务分配不公的抱怨。但另一方面,新婚期夫妻双方家务分工满意度最低,未必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必然规律,因为众多研究都表明,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周期变动不是线性的,而是呈U字型的曲线状态(Durall, 1971; Spanier等, 1975; Johnson等, 1986; Vaillant等, 1993),因此,本研究所显示的青年夫妇在新婚期对家务分配不均反映最为强烈的结果,也可能是社会转型期两性角色激烈冲撞、整合难度加剧的折射。转型期性别角色的变迁和重新定位,对两性都是一个挑战,新婚妻子会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贡献较大或因社会角色压力,而对丈夫共同承担家务寄予厚望,一些专事家务的主妇也会对家庭分工心存不满;丈夫则常因社会竞争激烈以及自己的成就动机,奢求妻子兼顾工作和家庭角色,甚至更期望妻子复归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如分析结果显示,24岁以下已婚男子没有人完全否定“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因袭观念(女性占39%),却有36%“非常赞同”(女性仅为9%),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明显倒退,而青年女性则对定型化的传统性别观愈持否定态度。因此,尽管新婚期的男女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最短,但对家务分配公平性的评价却最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变迁社会新旧性别文化相互冲撞、男女角色分配冲突显现的必然延伸。而要达到个人自由发展和建立夫妻伙伴关系的目标,必须摒弃传统的定型化两性分工模式和意识形态,尤其不要让“男高女低”、“男外女内”和“男主女从”的夫妻互动模式固定化、制度化,而应为女性的升学、求职和择业创造更公平的条件,倡导多元化的性别角色形象和性别平等的先进文化,使两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获得更自由的发展、夫妻伙伴关系更谐和与默契。

参考文献:

1. 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2. 沙吉才主编(1995):《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3. 沈崇麟等主编(1995):《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陶春芳等主编(1995):《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
5. 王亚林(1991):《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6. 徐安琪(2000):《婚姻关系评价: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
7. Barnett, R. C. (1994), Home-to-work Spillover Revisited: A Study of Full-time Employed Women in Dual-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647-656.
8. Brines, J. (1994),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 652-688.
9. Brody, C. J. and Steelman, L. C. (1985), Sibling Structure and Parental Sex-typing of Children's Household Task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 265-273.
10. Cohen, P. N. (1998), Replacing Housework in the Service Economy: Gender, Class, and Race-ethnicity in Service Spending, *Gender & Society*, 12: 219-231.
11. Coltrane, S. (1990), Birth Timi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Dual-earner Families: Exploratory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1: 157-181.
12. Coltrane, S. (2000), Research on Household Labor: Modeling and Measuring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Routine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 (4): 1208-1233.
13. Durall, E. M. (1971), *Family Development* (4th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4. Greenstein, T. N. (1996),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ives' and Husbands' Gender Ideolog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3): 585-595.
15. Hiller, D. (1984), Power Dependence and Division of Family Work, *Sex Roles*, 10: 1003-1019.
16. Johnson, D. R., et al. (1986), Dimension of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7(1): 31-49.
17. Maret, E. and Finlay, B. (1984),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Women in Dual-earner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6: 357-364.
18. Oropesa, R. S. (1993), Using the Service Economy to Relieve the double Burde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Service Purchas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4: 438-473.
19. Pittman, J. E, Solheim, C. A. and Blanchard, D. (1996), Stress as a Driver of The Allocation of Hous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456-468.
20. South, S. J. and Spitze, G. (1994), Housework in Marital and Nonmarital Househo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327-347.
21. Spanier, G. B., et al. (1975), Marital Adjustment over the Family Life Cycle: the Issue of Curvilinear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1: 263-275.
22. Szinovacz, M. (1992), Is Housework Good for Retirees? *Family Relations*, 41: 230-238.
23. Szinovacz, M. and Harpster, P. (1994), Couples' Employment/Retirement Statu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Task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49: S125-S137.
24. Thompson, L. (1991), Family Work: Women's Sense of Fairnes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181-195.
25. Vaillant, C. O. and G. E. Vaillant (1993), Is the U-curve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 Illusion? A 40 Year Study of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 230-239.
26. Waite, L. and Goldscheider, E. K. (1992), Work in the Home: The Productive Contex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South, S. J. and Tolnay, S. E. (Eds.),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pp. 267-299, Boulder, CO: Westview.
27. Zuo, J. P. and Bian, Y. J. (2001), 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A Case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4): 1122-1133.
28. Zvonkovic, A. M., Greaves, K. M., Schmiede, C. J. and Hall, L. D. (1996), The Marit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through Work and Family Decision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1): 91-100.

(责任编辑: 朱 犁)